

# 开掘和回应现实课题

## ——评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

1952年5月,在《和人民一道前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一文中,柳青认识到,高尔基、鲁迅等作家之所以有其“独到的思想和独创的风格”,就在于“他们是拿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创作的”。“到生活中去”成为这一时期柳青思考并实践的方向。在他看来,“我们伟大祖国就要开始的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的建设,更是社会意识的建设”。

约一年以后,柳青创作了长篇小说《在旷野里》(未完)。《在旷野里》是一部描述新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交互成就的重要作品。人民的伟大实践不仅包含着新生活的持续创造,还意味着拥有新思想、新情感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培育。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这部篇幅不长但内涵丰富的作品的主要内容。

起初,柳青打算写作一部“反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的作品,起因是“一些老熟人、老同志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不畏艰险,优秀卓绝,但在新形势下,因为一点物质享受或爱人子女问题,经不住考验,在自己光荣奋斗的历史上抹了一把黑”。柳青为这些干部思想的滑坡感到惋惜,也深切意识到“干部队伍的建设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不能在工作中持续学习,掌握应对新问题的能力,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就会受到影响。如何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正是小说《在旷野里》主人公、新任县委书记朱明山面临的紧迫问题。

作品首先讲述了县里集中各方力量消灭棉铃虫的工作。这一工作包含双重意义:它既是保证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举措,也是校验基层干部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的契机。县委书记朱明山和县长梁斌、县委组织部部长冯光祥、县委宣传部部长吴生亮,以及机关干部白生玉、李瑛,区领导张志谦、崔浩田,携带着既往的经验,投入全新的工作之中,一场不同观念和工作作风的复杂博弈就此展开。

柳青关注现实生活,书写现实生活,力求从中揭示一些问题,给人以启发、影响和引导、教育,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生活。在柳青看来,“真正进步的作家,在每个时代里,都是为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的”“他们光荣的任务是努力通过尽可能生动、尽可能美好、尽可能感人的形象,把他经过社会实践获得的知识 and 理想传达给人民,帮助人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境界”。《在旷野里》聚焦具体的生活实践,刻画人物思想转变的过程,回应时代的思想文化课题,展现出文学作品对经世致用的追求。

新的思想文化建设的关键,是“新人”的塑造。

倾心书写新人和新生活的交互创造,是柳青小说的重要特征。《在旷野里》10余个人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可以约略归结为“新生活”和“旧观念(经验)”之间的冲突,高远的



现实情况的冲突。赵振国、白生玉均属老干部,有着在战争年代积累的丰富工作经验。步入新生活,他们不仅面临着旧经验无从解决新问题的困惑,还面对着工作和生活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促进不同人物观念、情感转变的关键人物,正是朱明山。这样的新人无疑在全书中具有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在他的引导和感召下,梁斌、赵振国、白生玉等人物原本落后的观念逐渐转变,那些尚处于思想形成期的如李瑛、崔浩田等年轻干部,也因为有了可以学习的榜样,内心愈发笃定。

表现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人形象,也是《在旷野里》一个重点。书中塑造的种棉能手蔡治良善于思考,颇具创造力。他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除虫新方法,避免了旧方法的弊端,大幅提高了除害效率。蔡治良可被视为具有新的思想、心理、情感的新人。可以想见,在完成棉铃虫歼灭战、促进基层干部思想转变后,《在旷野里》接下来可能要述及的便是群众观念的转变。这一课题在《创业史》中得到了更为细致、充分的展开。

《在旷野里》描述的灭虫战斗可谓惊心动魄,少数干部思想的滑坡也得到深入刻画,但全书仍然洋溢着人民创造美好新生活的喜悦之情。作品甫一开篇,朱明山在车上满怀热情地畅想新生活。他有充分理解现实情境的能力,也具备对未来生活全新可能的想象力。正因如此,全书在对现实生活复杂细致的描画之外,充满乐观的精神和浪漫的情怀。

相较于《创业史》对风景描写的节制以及偏于史诗的凝重风格,《在旷野里》颇多抒情之笔,不仅自然风物足以感发人物的情志,书中主要人物对未来愿景的想象更具浪漫色彩。这些憧憬与想象并非凌空蹈虚的空想,而是扎根于具体的、正在展开的新生活的现实语境之中。在柳青看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是简单的结合,而是“化合”。朱明山们正在从事的是未曾有过的全新创造,一切尚在未定状态,有待攻坚克难、化为现实。这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真实写照,是以愿景为指引、有力推进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精神力量所在。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永远关注现实,始终向美好生活的创造敞开。

柳青佚作《在旷野里》并未完成,也未达到后来《创业史》那样叙事上的完整和成熟,但它的现实感、真诚劲儿清新扑面,思考的深度和笔力的遒劲都带着典型的柳青范儿。从米脂3年到长安14年,从《种谷记》《在旷野里》到《创业史》,柳青走出了一条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以文学叙事充分参与社会实践的创作道路。柳青的创作精神和文学遗产启发我们,小说家要有宏阔的历史观和清醒的现实关怀,要在密切关注现实中充分发挥文学的经世功能和现实意义。新时代,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生生不息,书写人民史诗的文学实践有待我们接续奋斗、再谱华章! 据《人民日报》

## 泥土下的乡村美学

——读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

拥有了“村庄”的轮廓、“生活”的点滴,以及对“自然”的深切体悟,这样的作品其深度自然不言而喻。

《一个人的村庄》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乡村风情画,无论是那方寸之间的庭院,还是辽阔无垠的田野,乃至村庄上空那片变幻莫测的天空,作者以文字精心勾勒,营造出一种既质朴深远又广袤细腻的乡村日常景象。

其深,在于真,真而不失自然,真而不流于浅薄。这份真,带着一种触手可及的实在与朴素,却又超越了简单的实与朴。它如同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洒在斑驳的土墙上,醇厚而质朴,既亲近又疏离,既显现又隐匿。

或许,正是在那样一个宁静的黄昏,炊烟袅袅升起,牛羊缓缓归家,耳边是风拂过麦浪的沙沙声,脚下是松软而带着泥土芬芳的乡间小路。抬头望向那熟悉而又略显陌生的村庄轮廓,心中涌动着关于它的点点滴滴、丝丝缕缕。村庄的气息与生活的烟火气交织在一起,对生活的感悟深深触动着心灵。刘亮程以真挚而深沉的笔触,精心描绘出这平凡而又独特的乡村生活,于是有了《一个人的村庄》。

阅读刘亮程的文字,一种独特的感悟在真实中沉淀。写乡村的文字虽多,但刘亮程的文字犹如“乡村的灵魂”。他的文字质朴平淡,却蕴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丰富与深厚。这种深厚连作者自己都未必能全然洞悉。它带着一种神秘感,许多情感难以说清道明,感受也未必准确,这或许正是乡村生活的多元与复杂所致。

相较于贾平凹《秦腔》中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时代印记,以及沈从文《边城》中湘西山水与人物的纯净之美,刘亮程的叙述则显得更为平实自然。他笔下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邻里琐事、农忙闲时,都充满了乡村生活的本真与质朴,让读者能够真切地触摸到那些瞬间,感受到乡村生活的韵味。这种贴近乡村生活的描写,毫不



晦涩与浮夸,实实在在地扎根于乡村的土地之上。

刘亮程将真实变得细腻而深刻,他放慢了节奏,放慢了观察与思考,简单生活,却又拓展了触觉与嗅觉。在那些放慢的过程中,衍生出的字字句句都显得那么自然流畅,毫无刻意雕琢之感。他写的不仅仅是村庄和生活,更是对生活的沉淀、自然的领悟,以及对乡村的情感投入和内心感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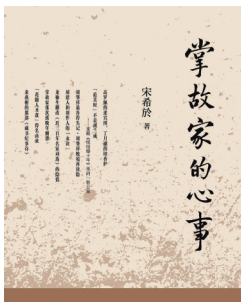
“文学写作,是一场从家乡出发,最终抵达故乡的漫长旅途。家乡是地理的,故乡是精神。”刘亮程如是说。世间的喧嚣、浮躁、迷茫、匆忙、疲惫、失落、孤独、焦虑,都需要一方宁静的村庄来调和、弥补和慰藉。而这份深邃,正是我们缓解世间疲惫的良药。正如陶渊明笔下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诗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都描绘了一种简单宁静的境界。而刘亮程笔下的村庄,虽只是小小的一方天地,却成了人们心中无尽的精神家园。

一方村庄看似寻常,但作家能以深沉的情怀将其写尽,实属难能可贵。同样,一种别具一格的生活呈现方式也是如此。刘亮程对乡村生活的描绘,既有农民儿子特有的质朴与情感寄托,又普遍地体现了对生命的深切关怀。他以独特的视角,透过乡村生活的表象,探寻到了生活背后的深邃意义。

刘亮程的作品中,质朴的语句随处可见。他有一支蘸满泥土的笔,写出的文字如同流淌的情感。读他的文字,如同回忆儿时的乡村生活,亲情、乡情都显得那么情真意切。《与虫共眠》中的趣味盎然,《先父》中的深情流露,《风中的院门》《我改变的事物》等篇章,都会让你在阅读后拥有另一番心境的开阔与心灵的触动。

村庄、生活、对自然的感悟,都是深沉而丰富的。在这本书中,平实而生动的日常成为了许多人心中乡村美学的典范。

李明心



《掌故家的心事》

本书主要关涉近现代学人、作家的生平行迹及其交游、著述、收藏等内容,尤留心种种旧传的未详、待考、不确、不真,发微索隐,言及前人之所未言,让旧掌故发出新光彩,且行文练达生动,下笔如探案故事一般,洋溢着“考据癖”的趣味,引人入胜。

作者宋希於,文史研究者,图书编辑。学术兴趣集中于文学史、汉学史、翻译史、出版史,尤注意近世以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所撰文章散见于《掌故》《上海书评》《南方都市报》。

自称“田村卡夫卡”的15岁少年,为逃避父亲的诅咒而离家出走。他最终落脚高松市郊外的甲村图书馆,在那里遇见了疑为生母的佐伯小姐。与此同时,一位智力低下的老人中田,被迫捅死了虐杀猫类的变态杀手,随后与偶然结识的卡车司机星野青年一起步入寻找“入口的石头”的旅程。两条线索交织并行,成就一篇奇幻诡异的现代寓言。

作者村上春树,日本著名作家、翻译家。主要作品有《挪威的森林》《国境之南、太阳之西》《发条鸟年代记》等。



《海边的卡夫卡》